

文学史的兴起

——程光炜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文学史的兴起

——程光炜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程光炜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1091-945-6

I. 文… II. 程…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709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8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程光炜，男，1956年12月生，江西省婺源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兼职教授。现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文学艺术评议组召集人。

目 录

大学与文学史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3)
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	(20)
“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	(38)
孙犁“复活”所牵涉到的文学史问题	(60)
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80)
评价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几个问题	(96)
一篇文章与对“伤痕文学”历史记忆和问题的检讨	(107)
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	(120)

叙事的可能性

文学叙事的权力	(137)
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161)
从《文艺报》一个栏目看五十年代文学的问题	(172)
如何理解“先锋小说”	(184)
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转型”	(210)
一个被“发掘”的诗人 ——《诗探索》和《沉沦的圣殿》所建构的食指	(230)
什么是“新世纪文学”	(244)
文学与传媒的几个问题	(256)
“新时期文学”的再叙述 ——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261)
处在转折期的七十年代诗歌 ——《七十年代诗歌卷》代序	(263)

回到“现场”

四十年代：文学杂志与现代都市

——《文艺春秋》和《文艺复兴》研究 (287)

四十年代与文人集团 (322)

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 (340)

小说的周边

王安忆与文学史 (367)

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

——莫言与文学批评 (386)

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

——我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 (405)

书后余言 (425)

大学与文学史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①

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特性”，首先在它与“当代”的多重纠缠，“当代”本身的激烈和复杂状态，决定了它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宣布自己是一个“纯文学”学科。其次，它要经常出现在各种“作品研讨会”现场，对“当前作品”开展繁重的宣传和评述工作。因此，当代文学学科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它是当前文学思潮、作品和现象最“理想”的“批评者”。显然应该认为，文学批评对当代作家和作品所进行的“经典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批评家对作品出色的认定和甄别，我们都无法知道哪些是“重要作家”、“重要作品”，文学史的课堂就没有了最起码的依据。但问题是，当代文学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已经是现代文学存在时间的两倍。它是否要“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而没有自己的“历史化”的任务？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编年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的“文学史”意义？它与众不同的文学思潮、批评方式、创作风格，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被指认的？它是不是存在着像 1949、1979 和 1985 年这样的历史分界点，这些分界点对文学史研究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另外，应该怎么认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如何看待文学杂志对作家观念的支配和引导，又如何看待文学事件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特殊作用等等，是不是都应该被列入研究的范围？这些东西，文学批评已无法面对，因为它们已经“沉淀”为“历史”。但我这里所谈的，不是具体的研究，而是一些研究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我所说的“可能性”是在什么意义上才具有有效性的问题。

2007 年 5 月，我写过一篇题为《诗歌研究的“历史感”》的文章。这

①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演讲稿。

篇文章涉及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因受诗歌问题局限,有些讨论实际没有展开。不过,它对一些概念的限定和表述,可以作为我讨论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问题的基础:“除去对当下诗歌现象和作品的跟踪批评之外的研究,一般都应该称其为‘诗歌研究’。它指的是在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用‘历史性’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一些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正因为其是‘历史性’的研究,所以研究对象已经包含了‘历史感’的成分。”^①显然,我所说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与跟踪当前文学创作的评论活动不同;其次,它指的是经过文学评论、选本和课堂“筛选”过的作家作品,是一些“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这样的工作,无疑产生了历史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过程中,“创作”和“评论”已经不再代表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它们与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因素处在同一位置,已经沉淀为当代文学史的若干个“部分”,是平行但有关系的诸多组件之一。这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所明确指出的:“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它“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文学史的重要目的在于重新探索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所以,它更大的价值是“重建历史的企图”。^②埃斯卡皮也认为,文学史家的作用“是‘跑到幕后’,去窥探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设法理解创作意图、分析创作手法。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作品的老化或死亡问题(笔者按:而这种观点是评论经常宣布的),因为他随时随地都能从思想上构拟出能使作品重新获得美学意义的参照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态度”^③。

一 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问题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是如何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不同作用和某些细微差别。我们知道,“文学批评”是先“文学

① 见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新诗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34页。

③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7页。

史研究”一步而发生的,它对“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对“经典”作品的认定或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成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批评在有些年代的地位过高,文学批评的作用就被无形地放大,会过分“干扰”文学史更为理性化的过滤、归类和反思性的工作。而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指的正是这些“影响”、“干扰”文学史研究的因素。这种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实际也不再是严格的文学批评,而具有了模糊暧昧的文学史研究的面目,并带有强行进入文学史叙述的现时功利性。

它模糊的文学史面目,在上世纪 80 年代是通过“文论化”(也即“批评化”)的研究方式建立起来的。^①一大批“文学批评家”,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他们的观点、主张、设想和结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和结论。^②这就是杨庆祥所指出的:“‘先锋小说’当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强调批评观念上的‘审美’原则和‘文本主义’”,提倡者“虽然比吴亮、程德培等人对‘先锋小说’的态度更加谨慎,但同属于上海‘先锋批评’的圈内人,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在‘重写文学史’中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李劫是当时最活跃的先锋批评家。所以说先锋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批评方法实际上对‘重写文学史’影响甚大。”^③其实,不光是当代文学史

① 在上世纪 80 年代,“文学史家”的角色是非常模糊的,而所谓的“文学研究者”主要是那些著名的批评家,如李泽厚、刘再复、鲁枢元、刘晓波、刘小枫、吴亮、许子东、季红真、黄子平、南帆、王晓明、蔡翔、李劫、夏中义,包括赵园、王富仁、钱理群、蓝棣之等等。很多人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探索文学书系”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这两套丛书中“出名”。而这两套丛书的主旨就是“提出问题”、“发表新鲜主张”,带有以“批评”代替“研究”的鲜明特色,为此,吴亮把它们概括成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批评即选择”。

② 人们不难发现,在 1979 到 1987 年间出版的许多当代文学史著作,如大家熟知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以及十四院校、九院校合作完成的诸多文学史著作等,都受到了上述批评家文学描述和批评的强大影响,很多“文学史结论”,事实上都是“批评的结论”。

③ 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未刊,系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博士生讨论课上的主讲论文。

研究,即使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种以“批评”的结果影响或主导“文学史”研究结论的现象,也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举例来说,就是引人注目的“鲁迅研究”。那些已经被“批评化”了的“鲁迅形象”,不仅成为许多鲁迅研究者的“研究结论”,而且也显而易见地成为关于鲁迅研究的文学史成果。^①另外,从当时提倡“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文章中一眼即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的基本结论,实际是这种“批评化”倾向的渗透和延伸,“批评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被等同于“文学史”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这样的研究眼光中,被预设的‘历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隐身在所进行的评价和分析过程之中。所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所观照的研究对象,丝毫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东西所‘强迫’的,他们往往还会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发明’和‘创造’。”^②

在这里,我不想比较“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优劣”,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仍然是一种“批评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想说,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文论化”研究倾向和方式,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历史化”,它们仍然以“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当前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什么是“批评的结论”和“文学史结论”的关系做一些初步讨论。

在一次关于马原小说《虚构》的课堂讨论上,一位学生对我和别的

① 参见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先驱者的形象》(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压在心上的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稍后出现的汪晖、王晓明、李欧梵的“鲁迅研究”在研究的角度和评价尺度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讲,王、钱的研究在鲁研界代表着“主流”形态,并成为国内鲁迅研究思想和学术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把鲁迅看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而且也看成是一种统驭所有文学现象的“标准”,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重要的起点和最后结论。这些结论,还带有“文学批评”的话语色彩,如“思想者”、“战士”、“匕首”、“孤独者”、“镜子”、“无地彷徨”、“反抗”、“生命体验”、“心灵的诗”、“说不尽的阿Q”、“鲁迅与20世纪中国”、“鲁迅与北大”、“脊梁”、“桥梁”、“人格魅力”、“摄魂”等等。

② 参见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新诗评论》2007年第2期。

老师合著的当代文学史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是我们作出的,而是来自吴亮非常有名的评论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的“结论”。^① 这对我有很大的提醒。我随即找来最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发现都有大同小异的情形。我注意到,批评家当年精彩的“最好的小说家,是视文字叙述与世界一体的”,“他不像大多数小说家只是想象自己生活在虚构的文字里,他是真的生活在自己虚构的文字里”的批评性表述,或者说这些其实非常“思潮化”的看法,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没有经过检讨和过滤就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也就是说,文学史并没有发挥“过滤”文学创作、批评和杂志等“现场因素”的职能,而对批评家的这种感性化文学感受采取了完全认同的态度。因为,将“最好的小说家”的“标准”等同于“虚构”的观点,恰恰来自1985年一种借叛逆“现实主义文学”而强调的“非写实”的思潮,是先锋批评根据当时文学转型需要而提出的临时性的批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根据丰富的文学史经验和参照系统,“最好”的小说家实际未必都一定是“虚构”型的作家。一种可靠的文学史叙述恰恰应该是,根据“批评结论”,参照当下思潮,并依据浩大历史时空中的诸多“最好”的小说家“类型”,来建立马原是否为“最好的小说家”的判断。我想这可能正是这位同学尖锐“质疑”我们的文学史著作的一个理由。

当然也必须看到,“文学史结论”不一定就具有学术上的优越性,很多“沉睡”多年的“文学史结论”,确实仍然需要“批评的结论”去唤醒和激活。文学史的“历史化”过程,如果完全抛开“批评结论”而最终实现也将是一个问题。但文学史结论更需要警觉的是,把“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或把对“经典”作品的认定和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不加选择地都带入研究工作中,致使文学史研究被不确定性的批评所裹挟、所笼罩,从而陷入“批评化”的尴尬境地。这不是我们故弄玄虚。这种文学史写作的危险性,确曾发生在1979年初版的两部重要的

① 参见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它的典型例证即是对浩然现象的仓促的“重评”。^①任南南在《历史的浮标——新时期初期的“浩然重评”现象研究》一文中认为:“这种重评作家的方式与拨乱反正的主流政治之间也呈现出良好的互动。‘文革’后,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一同展开的浩然重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革’后主流政治话语生产的一部分。”但她警告说:“浩然的去经典化,甚至矮化显示出把四人帮颠倒过去‘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的时代主题,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运用的文学手段,新时期政治合法化进程中的一个文学图示。”所以,她认为“浩然重评”很大程度上恰好是一个值得今天去检讨的“批评性”结论。^②

自然,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是由于当代文学学科对批评“当下性”过分迷恋的认知方式带来的。很多人都相信,所谓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就是针对文学“现状”而出现的一种批评性的表达方式。在当代文学学科中,“批评家”的地位一般都要高于“文学史家”,很多国家级的、“文学奖”最后获奖者往往是前者,就是一个可以随时列举的例证。这种“当下性”的“文学史意识形态”,并不认为“批评化”就是对文学史研究的直接损害,而是相反,它相信恰恰使“当代文学”学科处在比其他学科更为“前沿”和“敏锐”的历史处境中。^③正因为如此,“叙述圈套”说、“浩然重评”论至今仍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文学史结论”,没有人相信它们仅仅是“批评化”的结果。当然,我这样说,不存在“褒贬”任何一方的含义,目的是要通过它们之间地位的“差异性”存在,说明“批评

① 如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郭志刚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与“浩然重评”相关的章节,这些根据当时社会结论对这位作家的“重评”不仅遭到他本人的质疑,实际也是今天最具有“争议”的文学史问题之一。

② 任南南:《历史的浮标——新时期初期的“浩然重评”现象研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③ 类似情况近年来仍然如此。在出版图书中,与“批评”有关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明显占有绝对性的比重,如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南方批评书系”、200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世纪之门文艺时评丛书”、2004年前后山东文艺出版社的“e批评丛书”、2003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等多种。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文学史”研究丛书仅仅有200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文艺风云书系”这一套。

化”思维在目前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

二 认同式研究与有距离的研究

在当代文学学科中,很少有人会怀疑“认同式”研究有什么“问题”。既然“按照通常所知道的历史教科书知识,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被预设的。因为如果不能这样,我们就无法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和联系”^①。那么就不会去注意,即我们的“认同”实际是被历史所控制的“认同”。当我们以为是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它其实是在重复别的研究者已经建立的研究方法。

先说第一种认同化研究的现象。在许多大学讲授当代文学史的课堂上,一个普遍现象是对“主体性”理论的“盖棺论定”的解释。在不少研究中,从“揭露伤痕”到“建立主体性”的解释逻辑,有时候还成为评价“新潮小说”的一个权威性标准。出于对“十年浩劫”灾难的深切反思,“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显然,对“非悲剧”的“风格”的“反思”,它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潮小说对于死亡的表现可以说是对这种以偶然性为核心的小说结构的最有意思的象喻”,“在马原、洪峰等作家笔下,死亡都是那样毫无理由、莫名其妙”,“当‘神秘’成了新潮作家对于世界的唯一解释时,不仅科学、智慧、思想、公理、常识变得可笑,而且人与世界变得一样‘不可知’,我们只能任由迷信、宿命的气息对人与世界的篡改。这实际上不是彰显的新潮作家主体性的强大,而恰恰是其主体性脆弱不堪的证明。”^②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习惯于把“新潮小说”置于“主体性”视野中的做法,并不是出于自觉反思而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受到历史结论所控制的学术性认同。因为,当我们感觉是以“个人化批评”的立场来“反思”新潮小说存在的“问题”时,不是我们“发现”了,而实际是“主体性”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并纠正了它走向的历史性偏差。这正像一篇讨论“主体论”历史生成语境的文

① 见拙作《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新诗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吴义勤:《“悲剧性”的迷失——反思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美学风格》,《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